

社会经济史译丛

[荷] 包乐史著

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

看得见的城市

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

赖钰匀 彭 昉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会
经济史译丛

[荷] 包乐史著

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

看得见的城市

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

赖钰匀 彭 昉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荷) 包乐史著；
赖钰匀，彭昉译.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8
书名原文：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
ISBN 978 - 7 - 308 - 07914 - 3

I. ①看… II. ①包…②赖…③彭… III. ①对外贸易 - 经济
史 - 研究 - 东亚 - 18 世纪 IV. F753. 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3240 号

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
(荷) 包乐史 著 赖钰匀 彭昉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 黎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16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7914 - 3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总 序

跨越和沟通不同语种、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以此搭建社会经济史领域中外学术圈的桥梁，这是我们策划和编选这套丛书的目标。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相互之间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欧美、日本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

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

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界。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待开发的史料还有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的汉文古籍，以及东南亚、美国等地华人的文献与文物。仅从这个角度而言，引介和翻译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显得日益重要。

就学科而言，由于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各学科形成自身的特定概念、范畴、话语体系、研究工具与方法、思维方式及研究领域，对此但凡缺乏深入而全面的把握，相关研究就很难进入该学科体系，而其成果也难以获得该学科研究人员的认可。而专业人才培养、评审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专门研究是如此精深，以致许多学者无暇顾及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学术视野因此受到局限，甚至出现学科歧视与偏见，人类追求知识的整体感与宏观认识的需求亦得不到满足。

同时，不同学科的一些特定话语和方法，其实许多是可以相通的，学术壁垒并非如想像中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打通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其收获有时是令人惊喜的，原创性的成果也常在跨学科的交叉中产生。如从历史源头与资料中原创出经济学理论，或以经济学方法与工具研究历史问题获得新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弗里德曼、哈耶克、库兹涅茨以及为人熟知的诺斯、福格尔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因此，“社会经济史译丛”的宗旨与取向为：第一，在学科上并不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也将选择与之相关的思想史、文化史，或以历史为取向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成果，更欢迎跨学科的探索性成果。第二，在研究地域和领域的选择上，将不局限于译者、读者、编者和市场自然倾斜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本丛书将力推西方社会经济史的前沿成果。第三，译丛除一般性论述的著作外，也接受史料编著，还精选纯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在成果形式方面，

既选择英文著作，也接受作者编辑的论文集，甚至从作者自己的英文论著中翻译或加工创作的中文成果。在著作语种的选择上，除英文作品外，还特别扶持其他语言论著的中译工作。

龙登高

2009年5月于清华园

中文版序

1980 年的一个清晨，那时，厦门重新对外国游客开放不久。我在厦门海滨漫步，看到一幅难忘的美丽景色——在早晨的微风中，渔船队伍正往海上出发，那些舢板的白色风帆点缀在蔚蓝的海面上，犹如花瓣上初落的细雨，闪闪发光。我特别珍惜这难忘的美景，因为在不久之后，这些传统的航海工具将被现代的机械化船只取代。这富有历史情调的、浪漫的景色妆点着厦门海湾已经数百年，但仍不免在现代化的洪流中消逝。

那年我是应两位著名史学家的邀请来到厦门大学，他们是田汝康教授以及韩振华教授。在此前一年我在剑桥大学认识了田教授。这两位学者以研究海洋史闻名于世，并且是当时中国史学界少数研究该领域的先驱。田教授早在 25 年前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清代中国海外运输的文章，作为他的研究团队中最有热情的高足，韩振华教授则成为了我的学友，他致力研究东南亚的中国海外事业，特别是中国海上的岛屿。

相较于常识中认为中国对于海外贸易的兴趣缺缺，这两位历史学家的研究证明 18 世纪与 19 世纪早期，中国东南各省私人航海事实上承载了大量的乘客与货物前往南洋的各个港口，就像知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行的那样。根据他们对于鸦片战争前清代海外贸易的研究，一个大规模扩张的中国海上冒险事业

依靠着许多现今仍活跃于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社群展开。

何以在这两位学者之前没有学者注意到清代中国海外贸易与冒险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性？首先应指出这是因为以农立国的中华帝国惯于关注内部问题，对于海外贸易的史料记载不多。明朝初年，永乐大帝短暂地以一国之力支撑郑和舰队以后，中国历史上就不曾出现像欧洲国家那样对于海外探险事业的支持。朝廷乐于开放广州与外人贸易，并从这“天子南库”中获取利润，但是海禁却限制福建与广东居民出海贸易。然而，由宁波、福州与广州控制外国访客的贸易或贡物并不困难，控制中国的民间航海却并不容易，即使他们曾一度消失在海上，但不久便故态复萌。如果研究者意图寻找这些中国探险者在南洋一代经营海外贸易的中文史料，会发现数量并不多，但幸运地是，这些信息却在外文史料中被详细记录。因此要想深入研究中国海外贸易必须对中外史料进行详细的对比与整理，这也正是数年以来我与厦门大学的同行们所致力的工作。

中国海外贸易强盛的力量可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作为例子。当中国北方大地正臣服于满州铁骑之下时，郑氏父子在安海、厦门和台湾建立的海上帝国达50年之久。直到施琅克复台湾后，清政府才稍微放松海禁，并且重新允许沿海居民进行海外贸易。

海外的福建与广东移民在那些年里成为有实力的华人创业者，他们在海外从事渔业、贸易、垦荒与矿业等事业，展现出惊人的经济实力。但是相对于英国、荷兰与葡萄牙以政府之力支持的贸易者，中国的海外移民就没有建立海外殖民地的野心，他们也缺乏有力的支持。在海外的海港，中国贸易者受到热忱的欢迎，因为他们带来美丽的丝绸、瓷器与铁器。当地的居民用热带产品交换这些中国富庶精良的物品。我曾作过研究，在许多海外港口的发展过程中，固定或经常到来的中国船只通常意味着该港口经济的成长与繁荣。

30年前初访厦门之后，我经常回到厦门大学与我的中国同行们进行紧密的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与东南亚的历史关系。我非常荣幸

将这本中文版的研究题献给他们，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是我们过去几年长期对话的成果。我也特别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对于这部中文译本所作的努力以及周到的设想。

包乐史

2010年7月20日于莱顿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三扇机会之窗 / 1

第二章 跨文化贸易的经营 / 31

第三章 联系分离之地 / 79

注释 / 115

参考文献 / 131

索引 / 150

译后记 / 156

第一章 三扇机会之窗

在题献给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的《乌托邦》（*Utopia*）序言中，作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提到自己是在何时何地有了写作这本哲学性冒险故事的灵感——1516年，莫尔作为外交使节被派往比利时佛兰德斯省（Flanders）“去解决英格兰羊毛贸易中一些具有重大后果的争议”，他造访了安特卫普市（Antwerp）。在这个佛兰德斯人的港口城市里，他辗转认识了某位名叫拉斐尔·希斯洛德（Raphael Hythloday）的水手。此人“似乎已经过了他的盛年，他的脸是古铜色的，蓄着长髯，斗篷随意地披在身上。于是从他的仪态和举止，我认定他是一名水手”。然而，结果证实，这个饱经风霜的拉斐尔是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哲学家，他曾经与意大利探险家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结伴探访那个虚构的新大陆。几天后，莫尔邀请了这位环球旅行家到他所寄居的友人家中，在一阵寒暄之后，这三个人在花园中的长椅上坐下来，开始讨论各个欧洲与美洲国家不同的风俗与法律。在那个下午将结束之际，莫尔和他的朋友被这个访客的睿智和包罗万象的知识深深吸引住了，于是他们请他在晚餐后跟他们谈谈那个位于新大

陆外海，名为乌托邦的岛——“人们共同福祉的最高境界”。^[1]

莫尔将这场想像的、与乌托邦叙事者的相遇设定在安特卫普并不是偶然的。在16世纪，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来到这个以商业中心闻名的交易所兜售他们的货物。在佛兰德斯，“贸易”是这个城市的新婚妻子，人人都围在她身边跳舞。在欧洲的各个港口城市，重视并促进商业的政策在特定的传统与制度间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而这些传统与制度被所有交易者接受。位于水陆交通路线上的商业城镇确实是生活最国际化的地方，来自远方的旅人们在那里会合并交换他们的货物与蜚短流长。坐落在河湾处的港口城市如同通往富² 矿的矿脉般联系着内陆，它们是所有对海外世界好奇之人的宝藏。

在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里，叙事者马可·波罗蹲坐在伟大的忽必烈脚边的一块毯子上，在元大都庄严富丽的花园里，对招待他的主人讲述他疆域内一连串关于形形色色城市生活的故事。然而，如同读者渐渐意会到的，这一系列的故事是同一主题的阴郁变体：百万趣闻先生（Messer Millionì）对自己遥远家乡威尼斯的渴望。^[2] 忽必烈汗知道他永远无法亲自造访那些位于帝国边陲的城市，但他被这个威尼斯商人的故事诱惑了。每天晚上，他都要求听另一个城镇的故事，好让那个城镇出现在他的梦境中。

在其后，数十位艺术家可能让威尼斯成为了欧洲最常被描绘的城市。就算那些北欧国王的朝廷里未必有威尼斯的讲故事旅人，他们也至少必定持有卡那雷托（Canaletto）的画作，将它们挂在皇宫的墙上并以如梦似幻的眼光凝视着。如今富有进取精神的游客，口袋里放着一本 Lonely Planet 旅行指南，就可以在24小时内抵达世界上任何一个遥远的异邦。或者，如果他是一个懒散的、坐在扶手椅上的旅行家，他可以藉由在电视上收看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

nel) 来享受这一切。在世界各地旅游的历险故事,在今天已经变成一项快餐消费品。

在本书中,我将邀请你一起回到过去,拜访亚洲最著名的三个港口城市:巴达维亚、广州以及长崎。在过去,这趟旅行至少要用掉欧洲旅行者六到八个月的时间。在那些旷日废时的航程里,这三个缤纷的大商场,以其超凡的风貌和极具异国风情的魅力,点燃了水手与作家的想像力。它们各自都留下了为数惊人的文献和图像遗产,这使我不需靠着太多想像,就能够当你们的导游。^[3]相对于卡尔维诺那座“看不见的城市”,我将巴达维亚、广州以及长崎称为“看得见的城市”,因为没有任何其他 18 世纪的亚洲城市,比它们更频繁地以图像与文字被描绘。在这三个城市里,东方与西方以极端不同却又相似的方式相遇了。

但在我们开始这趟真实而又虚幻的壮游之前,让我阐述一下为什么举出这三个近代早期市场作为赖肖尔讲座的主题。最明显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所发表演讲的学术机构——哈佛大学,是费正清与赖肖尔的母校。这两位巨人指引我们这一辈的学者一条通往中国与日本历史的途径。这两个传统的帝国,在西方的挑战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发展出他们今日独特的世界强权。赖肖尔和费正清的《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型塑了我大学时代的整个研究工作,在莱顿,每一位未来的汉学家都必须了解日本。^[4]除了超凡的组织天分外,费正清最为人所记忆的,便是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设(1842—1854)》这本书中,他对通商口岸系统的开创性研究。

人们经常遗忘日本学专家赖肖尔也教导并写作关于古代中国以及其海上疆域的课题。圆仁法师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由赖肖尔翻译,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这两个领域有了交集。

这本书描述了一个日本僧侣为了向唐朝求取佛经，所饱经磨难的海上历险。^[5]可以说，这两位学者都有着共同的关怀。因此，既然我应费正清中心的邀请来主讲赖肖尔讲座，那么选择关于海洋的课题作为讲座内容，可以说是最恰当的。

海域范围

近年来，哈佛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关于季风亚洲的海洋
4 史研究。而近代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似乎没有引起费正清中心与赖肖尔中心研究者的兴趣。我希望藉由聚焦这三个港口城市，进一步指出了解中日两国各自与海洋领域的传统关系，对于理解近代早期（或是当代）的中日全球交涉史至为关键。如果中国与日本要在战略与经济影响力上一争长短，便是在中国海的区域里，在此海域中，这两个强权都在竞逐区域里的领先地位。

中国南海成为印度洋海上丝路的起点已经有一千年之久。但直到18世纪，它的港口城市直接连接于欧洲、非洲、美洲的港口城市，它才成为全球海运贸易的十字路口。正如大城、马尼拉、釜山服务于暹罗、西班牙属吕宋岛以及韩国的经济那样，巴达维亚、广州与长崎扮演着爪哇、中国与日本大多数地区的门户。这三个港口对历史学家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它们不仅是中国海外贸易网络的终点，同时，这个区域，也是最大的西方贸易势力——荷兰东印度公司，或称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网络节点。^[6]在这三个市场里，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海外职员所写的日记与报告描绘了当地的情形，这些关于港口生活的材料，在细节上与数量上是现存的其他史料所远远不能相比的。^[7]因此我们得到了大量的、还未被详

细研究的档案资料。^[8]

位于珠江边的广州，扮演中华帝国的海上门户已达两千年之久。在 17、18 世纪，广州如同其后为西方所熟知的一样，与其附属城市澳门一同成为国外商人在大清帝国的停泊港口。

长崎，这个被日本德川幕府指定的对外贸易港口，以其严格的国境法及对于保持自身认同的焦虑而闻名。长崎是中国及荷兰商人的东道主。而与其他外国人不同的是，唯有中、荷两国获准在长崎湾的两个人工小岛上进行交易。

巴达维亚，身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贸易帝国的船队会合点，⁵其城市生命的存续有赖贸易的恩泽。就像一只蜘蛛坐在自己的蛛网上一样，巴达维亚很理想地坐落于苏丹运河——正是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连接中国海的干道上。广州和长崎像个多少有点自我中心、拥有丰富资源但被压抑着商业传统的农业帝国的卖场，而巴达维亚则被建立为一个远洋贸易帝国的大商场，这个帝国在季风亚洲的区域经济里获取养分，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将来自亚洲的消费品提供给欧洲。

在数以千年计的季风带贸易史上，这三个港口是相对晚近的组合：广州与连带兴起的澳门先后兴起于 1567 年，而长崎和巴达维亚则在 1571 年及 1619 年各自被建设成国际商港。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讨论古老的中国世界经济体系，这三个城市的兴衰才能被正确地理解——它们若不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就是与之紧密相系。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福建商人对生意的敏锐反应，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了中国海贸易的驱动力量。福建商人形成了长崎和巴达维亚华人社群中的多数，甚至那些被指定为与外国人交易的“行商”，其网络也多半来自福建。

最后，在 18 世纪的 80 年代和 90 年代，正是在这三个港口城市

里，中国人、日本人以及荷兰人在亚洲迎来了第一批美洲的访客。跨越 18、19 世纪的 30 年在许多方面形成了一个东亚区域史的转折点——就像它们在世界史上一样——因而我决定把研究结束在这个地方。

时间框架

孔飞力（Philip Kuhn）的《现代中国国家的起源》一书将 18 世纪 90 年代视为中国的危机时期。^[9]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沿着中华帝国的边疆爆发，出现在西方的边境以及南方的海岸线。黄河和长江决堤，淹没了帝国中心区域的大片土地。此外，显而易见，中国人口的迅速扩张也造成了影响。18 世纪后半期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不止一倍，从一亿四千万人增加到三亿，造成了下列彼此相关联的现象：区域性的饥馑、内部移民，以及砍伐森林造成的生态失衡。最后，这个时期标志了从老态龙钟的乾隆皇帝（及他腐败的宰相和珅）往嘉庆皇帝的过渡。嘉庆皇帝虽然有个意味着繁荣年代的吉利年号，但他一登基，面对的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清理乾隆与和珅留下的残局，以及一个事后看来近乎不可能的任务：为他一团混乱的帝国重建秩序。

在日本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光景：自然灾害如浅间火山（Mount Asama）在 1783 年的喷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暴风雨、洪水及农作物的歉收。所谓的“天明饥荒”从 1782 年一直延续到 1787 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境内发生，平均每年超过 50 次。当德川家治将军在 1786 年离世时，一个新的、严格的节约政策和道德重整计划出现了，并且造成了海外贸易的进一步限制。

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目睹自己的霸权地位为季风亚洲贸易性质

变化所冲击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则承受着第四次英荷战争（Fourth Anglo-Dutch War, 1780—1784）造成的财物损失——在战事中，该公司的船只经常在英吉利海峡被敌国扣押。当拿破仑战争在 18 世纪 90 年代末打破了荷兰与亚洲的运输纽带，荷兰东印度公司只得宣告破产，而其停泊在巴达维亚的东印度货轮则被插着中立旗帜的船舰取代，在这些中立旗帜之中，美国的星条旗占了支配性的多数。

如果我们采取全球的视角，那么由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危机时期，正是这段历史的转折点。在经济事务上，亚当·斯密（Adam Smith）展现了一个新的、自由企业的思想范式，并且预示了重商主义及垄断商业力量的结束，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成形，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意识到在其他大陆上有其他伟大文明存在，对这些文明的知识就算不是茶余饭后的话题，也成了门外一个有趣的观察对象。

当法国大革命侵入各个邻国时——包括 1795 年的荷兰共和国⁷在内——政治变革的风暴将欧洲的旧体制横扫一空。在 18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不列颠在西半球失去了一个帝国，于是着手在季风亚洲打造另一个。而当这些事情方兴未艾之际，领航员和水手们从不断扩张的俄罗斯帝国及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出发，开始了漫长的跋涉与航行，来到了亚洲的东缘。

当然，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基于不同的地点及环境，以不同的速度对世界造成冲击。在 1800 年前后，我们见证了中国海上航海贸易的显著变化：包括在长达两百年之后，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群岛周围海域的控制开始失势，颇具规模的海盗现身于此，为数惊人的闯入者在这里寻找新的贸易通道。

早在 18 世纪 80 年代，欧洲大都会对于海外领地的新政策逐渐成形。身为东方海上贸易的支配者，获得特许的英属与荷属两个东